

毛泽东的宗教观研究

STUDY ON

THE RELIGIOUS THOUGHT OF

MAO TSE-TUNG

毛胜著



中国出版集团
研究出版社

毛泽东的宗教观研究

STUDY ON

THE RELIGIOUS THOUGHT OF

MAO TSE-TUNG

毛胜◎著



中国出版集团
研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毛泽东的宗教观研究 / 毛胜著. -- 北京: 研究出版社, 2020.5

ISBN 978-7-5199-0901-7

I . ①毛… II . ①毛… III . ①宗教 - 毛泽东思想研究
IV . ① A84 ② B92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0) 第 063236 号

出品人: 赵卜慧

图书策划: 张立明

责任编辑: 张立明

毛泽东的宗教观研究

MAOZEDONG DE ZONGJIAOGUAN YANJIU

毛 胜 著

研究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011 北京市朝阳区安华里 504 号 A 座)

河北赛文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2020 年 5 月第 1 版 2020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7

字数: 217 千字

ISBN 978-7-5199-0901-7 定价: 59.00 元

邮购地址 100011 北京市朝阳区安华里 504 号 A 座

电话 (010) 64217619 64217612 (发行中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 如有印制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历史现象，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2003年7月10日，习近平在浙江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上作报告时，强调“宗教不仅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还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并具体分析指出：“浩如烟海的宗教典籍，丰富了传统历史文化宝库”；“智慧深邃的宗教哲学，影响着民族文化精神”；“深刻完备的宗教伦理，强化了某些道德规范的功能”；“异彩纷呈的宗教艺术，装点了千姿百态的艺术殿堂”；“风景秀丽的宗教圣地，积淀为旅游文化的重要资源”；“内涵丰富的宗教礼仪，演变为民族风情的习俗文化”。^①还有学者放眼19世纪世界史，认为当时宗教在世界各地都是最高级别的力量，它“是个人人生价值的源泉，是形成团体和集体身份认同的基础，是划分社会等级的结构原则，是政治斗争的原动力，是人类进行深奥的思想讨论的领域”。宗教还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意义建构形式，即全部精神文化的中心”，是“唯一一种文化精英和未受过教育、以口头表达和形象比喻进行宗教沟通的普通大众均使用的文化表现形式，甚至常常是他们之间最重要

^① 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第220页。

的纽带”。^①

而今，在全球化不断加速的时代背景下，随着信教人数的增长^②、人口迁移的增加^③，以及历史遗留问题的存在，宗教在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领域的影响力不断增强。这引起国际社会各界的深刻思考。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更是激起了学术界长期而激烈的论争。亨廷顿认为，在冷战后的世界里，“文化的区别”取代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区别，成为最重要的一种区别。因此，最普遍、最重要和最危险的冲突，不再是以经济来划分的社会阶级或集团之间，而是来自“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他还反复指出，在界定不同文明、不同文化的客观因素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宗教；在一定意义上说，人类历史上的几个主要文明，“基本等同于世界上的各伟大宗教”。^④

尽管很多人对亨廷顿的观点持有异见，但在宗教因素具有极大影响力、宗教问题具有特殊复杂性上，学术界基本上形成了一种共识。2000年5月26日，钱其琛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建院五周年及其前身国际政治系建立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上，一方面表示“难以同意”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另一方面也认为宗教问题是“必须注意研究的一个问题”，并

①〔德〕于尔根·奥斯特哈默：《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强朝晖、刘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588页。

②据《国际宣教研究公报》2007年第1期公布的统计数字，在全世界总人口66.158亿人中，信仰各类宗教的人口比例达到85.77%，其中基督教21.955亿人，印度教8.88亿人，佛教3.86亿人，新兴宗教1.06亿人，锡克教2600万人，犹太教1500万人，部落宗教2.625亿人，华人民间信仰崇拜者3.88亿人。相比之下，非宗教信仰者7.87亿人，无神论者1.54亿人，两者合计只占世界总人口的14.23%。（参见叶小文：《中国破解宗教问题的理论创新和时间探索》，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4年版，第44页。）

③比如，欧洲穆斯林移民快速增长，宗教问题日益突出。由此引发的“法国头巾法案”“伦敦地铁爆炸”“瑞士宣礼塔事件”“挪威恐怖袭击案”等，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参见贾建萍：《欧洲穆斯林移民问题研究》，载《中国穆斯林》2012年第5期。）

④〔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订版），周琪、刘绯等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5、6、21页。

分析了宗教问题的几个特点：宗教问题不仅与民族问题密切相关，与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问题密切相关，与人权问题密切相关，与国家政局、民族分裂或统一问题密切相关，而且宗教认同往往跨越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必须予以高度关注。^①

具体到中国而言，信教人数在改革开放 40 年里的增长，可谓“爆炸式”发展。据“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课题组 2005 年的调查，在年龄为 16 周岁以上的中国人里，具有宗教信仰的人数为 31.4%，约 3 亿人；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和道教的信众占到总数的 67.4%；佛教、道教和民间信仰的信众占到总数的 66.1%，约 2 亿人；基督徒有 4000 万人以上。^②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课题组 2008—2009 年的入户调查，中国基督徒占全国人口总数的 1.8%，总体估值为 2305 万人，其中已受洗者 1556 万人，占 67.5%。^③据信德文化研究所的资料统计，中国天主教徒约 600 万人。^④各方数字不尽相同，但相比较于新中国成立之初，都是不可等量齐观的。尤其是基督教徒，从 1949 年 10 月的七十余万人，发展到今天的千万之众，称得上是几何级发展。

随着当代中国信教人数的不断增多，宗教的社会影响力与日俱增，与宗教相关的各种问题也层出不穷。对此，江泽民在 2001 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分析说，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看，我们必须深刻理解宗教问题的几个主要特点：第一，要认识到宗教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所以它将“长期存在并发生作用”；第二，要认识到宗教问题往往不是孤立的问题，

① 钱其琛：《当前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若干重点问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 年第 9 期。

② 参见孙铁玮：《当代中国人宗教信仰调查》，载《瞭望东方周刊》2007 年第 6 期。

③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课题组：《中国基督教入户问卷调查报告》，载金泽、邱永辉主编：《宗教蓝皮书：中国宗教报告（201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91 页。

④ 参见王美秀：《2009 年中国天主教观察》，载金泽、邱永辉主编：《宗教蓝皮书：中国宗教报告（201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98 页。

而是与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等密切相关，所以它“对社会的发展和稳定产生重大影响”；第三，要认识到宗教问题是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所以它往往与“现实的国际斗争和冲突相交织”。进而，他强调宗教是“一种群众性的社会现象”，宗教问题“具有特殊复杂性”，最根本的是把握“宗教存在的长期性”。^①随后，中共中央2002年“3号文件”更是详细列举了宗教领域和宗教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措施。^②

我们身边的信教徒越来越多，我们身边的宗教问题越来越多，社会上对宗教问题的争论也越来越多。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到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正面对着越来越多的宗教话题。近年来，包括学者们在内的各界人士，尝试从不同的视角阐释中国宗教发展的现象，探寻中国宗教问题的症结，并对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稍显遗憾的是，这些努力往往侧重于现实问题，虽然研究成果不少，观点与见解亦有价值，但缺乏历史的分析，难以搞清楚相关问题的来龙去脉。

笔者认为，历史与现实是相通的，研究中国今天的宗教问题，就必须弄清楚昨天的情况，特别是毛泽东时代的情况。1980年10月25日，邓小平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论毛泽东及其探索时颇有感慨地说：在很多方

①《论宗教问题》（2001年12月10日），见《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72—378页。

② 主要问题包括：（1）“一些地区宗教活动混乱，发展不正常，乱建寺观教堂、滥塑露天宗教造像和以各种借口聚敛钱财的现象屡禁不止”；（2）“一些地方早已被废除的宗教封建特权死灰复燃，利用宗教干预行政、司法、教育等情况有所抬头”；（3）“因民族、宗教因素引发的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发性和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4）“境外利用宗教对我国进行的渗透不断加剧”；（5）“达赖集团和‘东突’恐怖势力利用宗教进行分裂破坏和暴力恐怖活动从未停止”；（6）“打着宗教旗号的邪教和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猖獗”；（7）“不尊重信教群众的信仰、干涉正常宗教活动、侵犯宗教界合法权益的情况在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地存在”；（8）“爱国宗教团体和爱国宗教教职人员队伍建设还比较薄弱”。（《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宗教工作的决定》（2002年1月20日），《新疆工作文献选编（1949—2010）》，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546页。）

面，我们是把毛泽东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毛泽东反对错了的事情改正过来，把毛泽东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同时根据新情况有所发展。^①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在学习贯彻中共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也指出，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的，但不能忽视它与改革开放前历史的关系，要认识到它是在新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二十多年建设”这个基础上开创的；虽然两个历史时期在指导思想、方针政策等方面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的理论与实践，何尝不是如此呢？

探讨毛泽东的宗教观，比如他是如何认识宗教的，他对待宗教的基本态度又是什么，他所处时代的宗教政策留下了怎样的“遗产”（包括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遗留的问题等），既是历史的研究，也与我们认识和处理今天的中国宗教问题密切相关。如果从更宽的视野来考察这些问题，对我们理解当今中国的信仰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等问题，都不无裨益。

实际上，毛泽东无论是在青年时期，还是在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后，都非常重视宗教问题。就像他自己所言：“不能因为我们是无神论就认为宗教不存在。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信教是个客观存在，应该加以研究。”^③“不出入佛道，不对，有佛道，不管它怎么行？”^④1961年1月23日，他与班禅额尔德尼谈话时又说“佛学不可不学”，认为中国佛学院不

①《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1980年10月25日），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

② 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2013年1月5日），见《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12页。

③《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3页。

④《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90页。

能“专搞政治”，而是要兼顾学政治与学佛学，不能只是“政治上好”，“在佛学方面却没有学问”。他表示自己也很想研究佛学，有机会要请班禅给他讲一讲。毛泽东在谈话中，还说到佛教经典《金刚经》，认为它“很值得一看”。^①

毛泽东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据他的图书管理员逢先知回忆，毛泽东经常阅读宗教方面的著作和文章，对《金刚经》《华严经》等中国佛教主要宗派的经典，以及关于这些经典的研究成果，他“都读过一些”；对禅宗学说、慧能的思想及《六祖坛经》，毛泽东尤为重视，不仅“要过多次，有时外出还带着”，对哲学期刊上关于禅宗哲学的文章“几乎都看”；对“基督教的《圣经》，他也读过”。^②据他的翻译齐锡玉回忆，毛泽东会见英国坎特伯雷教长约翰逊时，就“圣公会教义的演变、英国君主担任圣公会最高元首对维护英国君主制的重要性、圣公会在英国历史上几个重大转折关头所起的作用等问题询问教长的意见，不时还插话提出自己的看法”。约翰逊教长告辞时，不禁赞扬毛泽东“对宗教问题有深刻的研究”。^③

新中国宗教学的起步和发展，也得益于毛泽东的关注和指示。1959年10月13日，他在中南海对任继愈说：“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这个问题。”现在，不能再忽略宗教问题，要抽调专人对基督教、佛教、道教各宗教进行

① 《同班禅额尔德尼的谈话》（1961年1月23日），见《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2页。

② 逢先知：《博览群书的革命家——毛泽东读书生活我见我闻》，见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编：《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逢先知在该文附记中，还记录了毛泽东1959年10月23日外出时要带的图书目录，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主要著作，《六祖坛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法华经》、《大涅槃经》，关于《老子》的书十几种，等等。

③ 齐锡玉：《我为毛主席作翻译》，载《中共党史资料》2002年第9期。

研究。^①1963年12月30日，毛泽东阅看了一份中央宣传部、中央外事小组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批示了一大段文字。他认为“这个文件很好”，不过也有缺陷，即没有“提及宗教研究”。他指出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世界三大宗教，“影响着广大人口”，但我们对各宗教的研究很不够，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他还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视角出发，强调“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文学史或世界史。^②遵照这个批示的要求，在周恩来的直接指导下，任继愈于1964年创建了专门研究宗教问题的世界宗教研究所。有学者认为，在国家层面成立专业的研究机构，在世界学术研究上“实属罕见”，体现了中国人“不排斥宗教”，愿意“了解宗教、学习宗教”，重视汲取宗教精神价值的独特宗教观。^③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客观对待宗教的存在与影响，并要求深入研究宗教的历史与理论，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寻找思想武器的探索中，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就宗教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其中，那些关于认识和处理中国宗教问题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成为毛泽东思想中宗教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可谓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中国宗教实际相结合的成果，也可谓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毛泽东时代宗教工作的失误和挫折，则提供了反面的经验，同样具有借鉴

①《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9页。任继愈后来回忆此事时说：“没太想到，作为政治领袖，他在哲学、宗教方面书读过很多，而且真看透了，记忆也很准确，谈话中准确引经据典来加强对观点的支持。他说毛泽东视野宽，掌握社会情况，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但并不偏颇，交流中谈话轻松而且深刻。”（参见任远、任重：《一份谈话记录和半个世纪的演绎》，载《中华读书报》2016年4月6日。）

②《关于加强宗教研究问题的批语》（1963年12月30日），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70—471页。

③魏德东：《世界宗教研究所五十华诞之思》，载《中国民族报》2014年12月23日。

意义。

以上说明，笔者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主要是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有感于宗教问题在历史和现实中的重要性，认为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课题；二是有感于毛泽东对宗教问题的重视，及其在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方面取得的理论与实践成果，认为这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对于今天依然很有价值。当然，本书在毛泽东研究、中国共产党宗教理论研究这两个方面，都有其学术意义所在。

一、研究对象及范围界定

顾名思义，本书的研究对象是“毛泽东的宗教观”，即毛泽东对宗教的看法和认识。这主要包含三层含义：（1）毛泽东关于宗教的观点，特别是毛泽东视野下的宗教信仰现象；（2）毛泽东对待宗教的态度，及其处理宗教问题的经验教训；（3）毛泽东观察宗教的方法，及其留给后人的启示。

由于对“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作为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毛泽东”与“毛泽东”的关系，以及“宗教”与“宗教观”的内涵，学术界有着不同的认识，所以有必要对本书研究对象的范围进行界定和说明。

（一）本书研究的“毛泽东的宗教观”，不仅是毛泽东思想中那些由毛泽东提出的宗教观点，而且是毛泽东关于宗教的所有认识。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二个“历史决议”，一个重要内容是从三个方面对毛泽东思想下了定义：一是强调它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一脉相承的关系，指出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二是为了区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强调毛泽

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三是指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但它是中共“集体智慧的结晶”。^①换言之，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共指导思想，其包含的各方面内容都是正确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则属于他个人的错误认识，不能归入毛泽东思想之中。

本书研究的“毛泽东的宗教观”，包括毛泽东思想中那些由毛泽东提出的宗教观点，而且这是主体部分；也包括除此之外的毛泽东对宗教的正确或并不完全正确的个人认识。也正因为此，本书题目定为“毛泽东的宗教观”，而不是“毛泽东宗教观”或“毛泽东宗教思想”。这或许有些类似于美国学者施拉姆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方式。他曾对中国的翻译者强调，他的书名是“The Thought of Mao Tse-tung”（毛泽东的思想），而不是“The Mao Tse-tung Thought”（毛泽东思想）；并指出“The Thought of Mao Tse-tung”中“Thought”，首字母为大写，即不可写成“thought”。这表明施拉姆的研究对象，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发展”，而不是中共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也就是说，施拉姆很重视这两个概念在“内涵上有所不同”。同时，施拉姆使用“The Thought of Mao Tse-tung”，而不是西方学者惯常使用的术语“Maoism”（“毛主义”），也暗示了他的学术倾向是“试图尽可能地淡化此项研究之意识形态色彩”。在施拉姆看来，虽然建立在毛泽东个性和中国所处困境基础之上的基本原理“具有持续性”，但毛泽东的思想及其作用在贯彻过程中是“不断变化的”。^②

尽管本书未必能涵盖毛泽东关于宗教的所有认识，但这个目标是明确

①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56页。

② [美]斯图尔特·R.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田松年、杨德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译者序”第5页、“导论”第6页。

的。更何况，就毛泽东的身份和影响而言，无论是正确的宗教观点，还是不完全正确的认识，都对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宗教工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就此而言，那些不完全正确的认识，不仅不可忽视，而且具有研究价值。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助于我们今天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

（二）本书研究的“毛泽东的宗教观”，不是“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宗教观，也不是“作为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毛泽东”的宗教观，而是毛泽东个人的宗教观。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对宗教的认识，特别是《毛泽东早期文稿》中的相关内容，是本书关注的一个重点，但这些内容不能说是“作为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毛泽东”的宗教观，尽管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

至于“毛泽东的宗教观”不是“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宗教观，就类似于上面所述的“毛泽东的思想”与“毛泽东思想”一样，指本书研究的“毛泽东的宗教观”不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即便是本书研究中提及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李维汉等人对宗教的认识，也只是作为历史背景的一部分，抑或是“毛泽东的宗教观”对其他中共领导人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的影响。

（三）本书研究的“宗教”，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是一种信仰，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实体。

关于“宗教是什么”，古今中外向来有着形形色色的观点。早在1878年，被称为近代西方宗教学奠基人的麦克斯·缪勒，就坦率地说：“世界上有多少宗教，就会有多少宗教的定义。”他还认为，对于“坚持不同宗教定义的人”来说，他们之间的敌意“几乎不亚于信仰不同宗教的人

们”。^①鉴于这个问题在本书研究中的重要性，这里稍作展开。

西方学者给宗教下的定义，大致有三种视角，即结构性视角、功能性视角、结构与功能相结合的视角。比如，詹姆斯·乔治·弗雷泽强调他眼中的宗教，是指人对“超人力量的迎合或抚慰”。所谓“超人力量”，就是被人们认为“能够指导和控制自然与人生进程”的力量。弗雷泽还认为，宗教包括理论（对超人力量的信仰）和实践（讨超人力量欢心、使超人力量息怒的种种企图）两大部分。^②

又如，威廉·詹姆斯指出他对宗教的定义，是指“个人独自产生的某些感情、行为和经验”，这些所思、所想、所为，使这个人觉得“自己与他所认为的神圣对象发生关系”。詹姆斯认为，这个关系“或许是道德的，或许是物质的，或许是仪式的”；因此，那些神学、哲学和教会组织都是从他所说的宗教中派生出来的。^③

再如，阿尔斯顿为工具书撰写的“宗教”词条，则是通过分析各种宗教的共同特征，来探讨“宗教是什么”。他从九个方面来概括宗教的构成特征：一是有神“信念”，即相信神灵的存在，或是相信“超自然的存在物”；二是区分“神圣”与“世俗”，即认为“神圣的对象”与“世俗的对象”是不同的，是应该区别对待的；三是宗教仪式，即围绕神圣的对象进行各种含有意义的活动；四是“道德律令”，即相信神规定了诸多道德要求和律令；五是宗教情感，即相信敬畏感、神秘感、负罪感等特有情感，是由神圣对象的显现或宗教仪式等所唤起；六是“人神交往”，即通过祈祷和其他形式实现人与神的交流；七是特殊的“世界观”；八是特殊的

① [英] 麦克斯·缪勒：《宗教的起源与发展》，金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3 页。

② [英] 詹姆斯·乔治·弗雷泽：《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徐育新、汪培基、张泽石译，大众文艺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8 页。

③ [美] 威廉·詹姆斯：《宗教经验种种》，尚新建译，华夏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9 页。

“人生观”；九是“社群”，即基于上述诸方面形成的宗教社团。^①

马克思主义者的阵营，对宗教的认识也不尽相同，特别体现在“反映论”和“鸦片论”的争论中。“反映论”是恩格斯在批判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杜林时提出的一句名言：所谓宗教，是指“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②“鸦片论”则来自马克思关于“对宗教的批判”的一段论述。马克思认为，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它的抗议。进而他形象地阐述了宗教的功能：宗教是“无情世界的情感”，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人民的鸦片”。^③后来，列宁出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将“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个论断单独提取出来，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石”^④，影响深远。

具体到中国来说，宗教是什么，以及儒教是不是宗教，乃至中国有无宗教，都是学者们长期争论的问题。正如华裔美国社会学家杨庆堃所指出，在中国、印度、欧洲三大文明体系中，只有中国宗教的社会地位“最为模糊”。中国有两种令西方基督教迷惑的现象，一是到处可见的把他们“拒绝承认作为宗教一部分的巫术势力”，二是“世俗取向的、持不可知论的儒家传统”在政治、社会等方面占据主导地位，而不是“宗教教义、强

① 参见张志刚：《宗教是什么？——关于“宗教概念”的方法论反思》，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②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03页。

③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年10—12月），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④ 《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1909年5月13日），见《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47页。

大的神职势力”。^①杨庆堃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基督教世界的模式为参照物，来探讨中国文化中的宗教现象的结果”。因为“在西方社会组织性的架构中，基督教有着正式的组织性体系，并拥有非常明显的结构性地位”；与之相反，中国没有“一个结构显著的、正式的、组织化的宗教”，老百姓的宗教信仰仪式通常是非组织性的。这难免导致他们觉得宗教“在中国社会和道德秩序中好像不那么重要”。

鉴于中国的特殊情况，杨庆堃提出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可以分为两种结构：（1）“institutional religion”（制度性宗教），它有“神学、仪式和组织体系”，有“基本的观念和结构”，因而自成一种社会制度，“独立于其他世俗社会组织之外”。（2）“diffused religion”（分散性宗教），它的神学、仪式和组织都不是独立的，而是与世俗制度和社会秩序其他方面的观念和结构密切联系在一起；它作为社会组织整体的一部分，通过分散性形式发挥多种功能。杨庆堃据此认为，尽管“有组织的宗教”在中国不够强大，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化中存在“宗教功能价值或宗教结构体系的缺乏”。^②笔者认为，杨氏基于中西比较的论点，是非常有见地的。^③

无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是当代中国宗教界人士及各领域学者，也对“宗教是什么”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在1937年讲授辩证法和唯物论时，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宗教本质理论的观点，对宗教与唯心论进行了专门分析。关于宗教和唯心论的起源，他解释说：原始人类

①〔美〕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范丽珠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22页。

②〔美〕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范丽珠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4—35页。

③这个论点在中国宗教和中国社会研究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所以倍受中外学者的关注。（参见Weller、范丽珠、Madsen等：《制度性宗教VS分散性宗教——关于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的讨论》，载《世界宗教文化》2010年第5期；范丽珠、李向平、郑筱筠等：《对话民间信仰与弥散性宗教》，载《世界宗教文化》2013年第6期。）